



【社会观察】

□文双春

读媒体对张杰院士离任上海交大校长时讲话的报道,印象最深的是“动刀论文奖励,排名不降反升”。“很多教师记得,他担任校长对科研政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取消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有人担心这会影响到教授们的科研积极性。可张杰认为,学术追求是大学灵魂,必须无功利目的,‘我们不能为发表论文而做研究,而是应该出于探求未知,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必须还科研的学术追求本质。’”

大学奖励论文的目的,笼统说是激励科研,具体说是激励老师们多发论文、多发好论文。在全国高校都在重奖论文时,上海交大反其道而行之,实践证明不仅没有出现许多人担心的情况,反而“排名不降反升”,说明现金奖励在科研领域不仅失灵,其作用甚至适得其反。这令人好奇又生疑,值得探究和反思。

国外对金钱能激励什么、不能激励什么一直有研究。最著名的成果如趋势专家平克的著作《驱动力》,颠覆了传统的“给我奖励我就更努力”的激励理念。平克把驱动力分成三个层次,认为个人和组织提高绩效、焕发工作热情的秘诀,不是我们的生物性驱动力或者追求奖励、逃避惩罚的第二种驱动力,而是我们的第三种驱动力,即我们想要主导生活、延展能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深层欲望。他通过考察facebook、google等公司的大量创新例子,发现最好的创新成果都不是在金钱激励下完成的,相反,“如果你使用金钱激励,让人去执行你想要的方式,这些奖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成绩下降,扼杀创造力,抑制善行,鼓励走捷径及欺诈等不道德行为,使人上瘾以及滋生短视思维等。”

世界领先的创造力研究者之一阿玛贝尔发现了类似现象:当人们不为金钱而工作时更富有创造性。金钱只对单调工作(如计件工

从校长的离任讲话说起

作)有很好的激励,而对于需要思考、创造力或解决问题的活动,金钱是与人的内在动机作斗争并减少这种动机的因素。她做了个试验,请一些艺术生针对某个主题分别创作一幅画,告诉其中部分学生画作完成后会获得奖励,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不知情。结果表明,明显缺乏创造性的作品均出自那些知道画作完成后可拿奖励的学生之手。阿玛贝尔指出,那些纯粹为艺术本身的愉悦而追求自己的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家被公认为更优秀,正是那些最没有动力去追求外在回报的人最终取得最高成就。

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一样,不是单调工作或简单劳动,而是创造性活动,其驱动力是兴趣或好奇心,即属于第三种驱动力。金钱之所以不能激励科研工作,在于外部激励与内在动机之间的差异,导致奖励只会更加激励人们得到奖励,而不是做好事情。上海交大“动刀论文奖励,排名不降反升”,其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其实,论文奖励一直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诟病。最狠的要数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谢克曼对《自然》《科学》等所谓奢华刊物的抨击,他认为科学研究正在因“最奢华而不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回报”的不恰当

激励措施而受到损害。特别是一些学术机构给在这些奢华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以重奖,他认为这是一种“贿赂”,正如华尔街需要破除红利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对个人有利而对金融系统有害的冒险行为)一样,科学必须破除奢华刊物的暴行。

反观身边,一些高校或院系一直在调整论文奖励政策,不难发现,真正喜欢科研的老师对奖励政策真的很麻木,有没有奖励都一如既往地做研究。不排除少数老师对牵涉到金钱的事情动辄锱铢必较,他们往往是反对动刀论文奖励的主力军。从“学术追求是大学灵魂,必须无功利目的”看,这些少数老师如果因对金钱不满而离开学校,对学校的发展其实更有利。科研就像爱情,如果冲着金钱而去,不会有好结局,即使勉强维持,也很难从中得到快乐。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很少有用现金奖励论文的,即使有教授得诺贝尔奖,充其量奖励一个停车位。世界一流大学奖励论文,往往是从驱动科学研究的内在动机入手,例如认可老师们的成就,给老师们提供有帮助的反馈、充裕的时间、充分的自由以及追求激动人心想法的必要资源。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个人记忆】

命运改变赖“77”

□张树亭

1977年恢复高考,从根本上改变了十几万青年的命运。其中尤以66、67、68所谓“老三届”的居多。

1968年春,经过一年多“文革”洗礼的“老三届”被赶回家。当时的共同心境是一片迷茫:寒窗十冬载,难道就这样完了?好在还有墙上的“画饼”:大学还是要办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来由贫下中农从优秀者中选拔、推荐、保送学员……至于何时“办”,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我回村干了半年活,看到大队买来一台“195”柴油抽水机,心想: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有知识,懂技术,这开机器活,当然非我莫属。但很快,由大队“革委”第一权力人的儿子干上了。不久,大队又买来一台“小12”拖拉机,我想:这下,第一权力人的儿子开拖拉机,那抽水机该让给我了。但很快,“革委”第二权力人的儿子接过去了。想当“吃香社员”无望之下,我去了一所“农中”任民办教师。心想:好好干,争取当上“代课”教师,然后再慢慢争取转为“公办”教师。但当时的学校教学、管理都一塌糊涂,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势下,1969年秋征兵时,我毅然投笔从戎。当时设计的美梦是:若干得一般,只要不犯错,三年后复员,至少能安排个正式工作;若干得好,能入党、“提干”,那就更好了……

1970年夏,国家开始落实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这样的消息曾带来意外的惊喜:又多了一条路子。但很快,摆在自己面前的路皆被堵死。

1972年夏,南京外语学院招生,分配给我们团两个名额。我闻讯急忙去团政治处报名,组织干事是老乡,他对我实话实说:报名有啥用?我们团光高干子弟就13个,每年保送名额才一两个,普通战士哪里捞得着啊?

1973年秋,我入了党,但提干已不可能。在无任何出路的情势下,1974年冬,我向连队提出复员要求。

回到家,公社中学聘我为民办教师。我很快融入了学校老师的群体。他们都很同情我,给我出谋划策:好好干,最重要的是跟公社干部“搞好关系”,争取去公社当个秘书,或武装部干事,或供销社售货员……天哪,叫我去“搞关系”?那是我一生的最短板。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苦苦挣扎数年,到处碰壁;而今环顾四周,又看不到一点希望,加之“老冉冉其将至兮”,所以,到1977年,我已心灰意冷。“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富贵在天”“君子不与命争”……每当闲下来,脑子里便涌出这些古代圣哲的名言佳句,将那偶尔泛起的本已很不强烈的心犹不甘一点一点地消解、泯灭……正因此,当1977年10月20日晚听到平地春雷——中央台播发的“国家恢复高考”消息时,才会那么绝处逢生般的惊喜若狂。12月9日开考,当我紧张地坐在考场里做题时,把每一题每一字都当做救命稻草而极力做到精益求精,有时甚至到了画蛇添足的地步。比如解词:踌躇——犹豫不决。后面又写道:“若与‘满志’结合构成‘踌躇满志’,则表示胸怀大志,欲有一番作为于番事业。见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注释。”其实,答出“犹豫不决”四字,满分“2分”就全得来了,后边的那些完全多余。

1978年春入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改变命运”都是众多落魄学子常谈的一个话题。我本以为我之道路已够曲折、典型,没想到比之不少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那些所谓“高成分”子弟,处境尤其惨。比如杜某,出身地主,十多年里他为改变命运受尽凌辱而几欲轻生。当得知恢复高考时,他是偷着报名而后又偷着参加考试的。直到高考分数过线招录,其大队、公社仍以成分问题不予放行。那年中秋节,各宿舍组织酒会,会上,又说起这个话题,有人怒发冲冠,有人痛哭流涕。杜某模仿李煜的《虞美人》重新填词,其下阕是:“无事常凭栏,泪湿青衫。降生容易活着难。雪融冰消冬去也,天上人间。”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读史札记】

□肖复兴

历代以来,对于为官者,清廉都是首要标准。这条标准,既属于高线,也属于底线。在古代,“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应的是“家贫清史在,身老白云深”。前者,是当时的民谣,是对贪官愤怒的写真;后者,是海瑞的名诗,是对清廉警醒的自律。在海瑞眼里,是把清廉和清白放在一起的,清廉是从政的政治标准,清白是为人道德标准。所以,后世者,烈士方志敏有“清贫”之说,作家张承志有“清洁的精神”之说,将其上升为精神层面。

只是,这些古训、这种精神被一些人抛掷在遗忘的风中。不必为清廉再定义和正名,只需重新温习历史,重新寻找那些清廉的榜样,便可以将这种精神大旗高高扬起——既为廉政,也为良心;既为百姓,也为自己。

作为清廉之官的典型,包拯包孝肃公,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并景仰。他任广东端州知州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传下佳话。端州端砚,自古有名,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端州知州的其中一项任务,便是向民间征收上品端

端砚和盐票

砚,进贡皇帝。在包拯前后任职端州知州的官僚,没有不借此机会中饱私囊的。他们贪端砚为已有的方法几乎一致,便是大笔一挥将进贡数目扩大几十倍,然后将余下的据为己有,用以贿赂上级官员和朝中权贵,让端砚成为升迁的敲门砖。这和如今时兴送字画古玩一样,成为雅贿。包拯任端州知州期间,命令匠人只做好进贡数量的端砚。直至离任,他也没带走一方端砚。

相比之下,有些人唯利是图,眼睛近视,将端砚立马量化为金钱数目,转化为仕途筹码,而包拯看重的则是自己的名声和良心。在价值系统的天平上,就是这样悬殊。

曾国藩是清廷重臣,也是清廉为官的典型。他任两江总督时,淮盐和端砚一样,很出名,是当地财源之一。他亲自创立两淮盐票,这种盐票面值是两百两银子,但利息很高,一年下来即可以有三四千两银子的可观利息。后来,盐票水涨船高,已经从每张两百两银子涨到两万两。当时,谁家只要有一张这样的两淮

盐票,就等于发财了。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盐票又是自己设置并颁发的,揣上几张这样的盐票,应该算不上什么贪污或以权谋私。即使他自己不拿,他的孩子或亲属打着他的旗号拿上几张,他也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曾国藩交代亲属,绝对不可以承领一张盐票。他离任时没有拿走一张盐票,他的孩子和亲属也没拿过一张盐票。

包拯和曾国藩的事例告诉我们,廉政需要法制制约,也需要官场的伦理学教育。如今,我们缺少这样的一堂教育课。记得包拯家训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这是为官伦理学中最高的警戒和惩罚了。这样做,起码让为官者有一丝畏惧。曾国藩家书中,将“清慎勤”三字家训全都改了,其中第一个字“清”改为“廉”字。未能有廉无以为清,廉是物质性的硬性标准,清是精神性的自省纬度。如此,清廉才可能成为由外到内、由政治到道德的整体。这也是官场伦理学的必修课。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